

试论徽商价值观的影响

赵懿梅

(黄山学院 徽州文化研究所,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在崇德与治生并重的双重价值取向指导下形成的独特徽商价值观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徽商价值观不仅影响着徽商的经营,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徽州社会,影响着徽州人的价值观。

关键词:徽商;价值观;影响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6-0007-03

徽商作为明清之际商人阶层的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别于传统道德优先的价值取向,徽商确立了崇德与治生的双重价值取向。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专制进一步加强,儒家价值观深入民众骨髓,居于统治地位。来自“程朱阙里”的徽商并没有对传统价值观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仍将崇德的价值取向置于逻辑优先地位。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达,商业贸易繁荣。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传统的道德观念、社会阶级构成、社会生活方式均发生了变化。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学者们对“治生”与“四民观”提出了新的见解。在这样丰厚的历史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徽商,面对生存危机与传统观念的矛盾,事实上将“治生”纳入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之中。

在崇德和治生双重价值取向的指导下,徽商对儒家传统价值观进行整合,赋予其崭新的内容。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引入商业经营中,重点对传统的诚信观、义利观、本末观、贾儒观进行改造、变通和融合,从而使以商业为“功名”的价值观为整个社会所容受。

徽商价值观的确立,不仅标志着徽商心理整合的完成,徽州商帮的形成,而且还深刻地改变着徽州社会,改变着徽州人的价值观。徽商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徽州人大量经商的社会风气。徽商独特的价

值观还深刻影响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贾而好儒”使得徽商在经营之中切实地践行儒家的道德伦理,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和极高的商业信誉。但同时也内在地包含了摧残商业的因素,阻碍了徽商的进一步发展。

一、徽商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徽州人服贾求生的社会风气

徽商的价值观改变着徽州社会和徽州人的心理,使越来越多的徽州人认同了服贾求生在价值上并不卑下的观念,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气,吸引了更多的士、农加入商人的行列,扩大了徽州商帮的队伍,并使徽商的事业得到徽州社会最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宗族势力的支持。而越来越多的徽州商人也在新价值观的鼓舞下,理直气壮地争财逐利,谋求商业的成功。

传统的徽州社会深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明代以前的徽州人仍以农耕为生,“成弘以前,民间稚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穡事,敦厚让,崇节俭”^{[1]P5},百姓信奉“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读曰耕”(黟县古楹联)。虽然徽州人经商业贾的行为早已有之,可是并不能获得徽州人的普遍接受和认同。在徽州“山多地少、土瘠人稠”日益严重的

收稿日期:2008-03-11

基金项目:黄山学院科研资助项目(2006xsk026)

作者简介:赵懿梅(1981-),安徽黄山人,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徽商。

生存危机面前,一些徽州人选择走出家门业贾为生,并且取得了成功。伴随徽商的影响越来越大,徽商作为一个阶层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要求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再加上儒家传统价值观带来的心理压力以及生存危机的压迫,致使徽商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以对抗传统的价值观。而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尚的改变、思想理论的革新(特别是明清之际学者对于治生论与四民观的阐发)也为此创造了的条件。随着徽商声名的日益提高,他们“良贾何负闾儒”的价值观念在徽州本土得到广泛的传播,深刻影响了徽州人的从业观念。明中叶以后,徽州的社会风尚发生了很大转变。徽州人服贾治生的现象越来越多,并公然宣称“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黟县古楹联)。徽州人已经事实上不将商贾视为末途,而认为贾与儒都是正当的治生之途。

徽商价值观对于传统贱商观念的突破,极大地鼓舞了徽州人。大量的徽州人外出经商,形成了“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社会局面。徽州一府六县中,歙县“业贾者什家而七”^{[2]卷五十二,海阳处士金仲公文配戴氏合葬墓志铭},休宁“大都以货殖为恒产”^{[3]舆地志·风俗},祁门“服田者十三,贾十七”^{[4]卷四·风俗},婺源人则大多以贩运木材和茶叶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在徽州本地,服贾为生已蔚然成风。

不仅如此,徽州人世代经商、举家经商的现象也比皆是。汪道昆的汪氏家族就是杰出代表。其曾大夫以上仍是“率孝悌力田”,而“大夫、先伯大夫始用贾起家,至十弟始累巨万。”^{[5]卷十七,寿十弟及曾序}歙商黄崇德善于治生,并“率其子弟宗人商于淮南,子弟宗人皆能率公之法而为廉贾。于是埭塘黄氏胥富等千户侯,各重素封矣”^{[6]卷五,黄公崇德传}。歙商伯谐“自曾祖继善公,拓其资产,甲于乡邑。祖自宽公,……资蓄益厚,业益广,……父良铎公,承数世之积储,愈至丰硕,而后挈其资贾盐于淮浙。”^{[7]卷五册,一廉公休宁商汪福光}“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里人争用其术,率能起家。数十年来,乡人称富者,遂有西门汪氏。”^{[8]卷六,益府典福光公暨配金夫人墓志铭}这些举家经商的商人依靠宗族的势力,在商业经营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万历《歙志》卷十记载:“邑中之以盐筴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有黄氏,后则有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9]民国《歙县志》卷一《风俗》}记载:“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

之叶,皆是也。”^[10]这些宗族经商成功的例子更进一步刺激了徽州人的从商心理。

随着在徽州社会服贾成为风尚,徽州人以经商为生的人数越来越多,徽州商帮的力量也日益壮大,造就了“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徽商盛世。徽商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整合也在更大的范围内继续进行着。

二、徽商价值观深刻影响了徽州人 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

崇德和治生双重价值取向指导下的徽商价值观深刻影响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徽商“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首先表现在努力地集贾儒于一身,或左儒右贾,或左贾右儒,将儒家伦理道德引入经营之中,形成独特的商业之道和经营理念;其次表现在,徽商在获利之后,总是大力投资教育、宗族事业,亦儒亦贾、贾儒相通、叠相为用,造成了贾儒的良性循环。明清之际的徽州科举及第因而盛极一时。歙县一地明清两代中进士 600 多人,清乾隆年间还出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八进士”的盛况。

“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反映了徽商虽然要求改变商人的地位,却在内心深处仍然将“业儒入仕”作为终极的理想目标。业儒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科举得中,踏上仕途,即可尽忠报国家,更可通过显亲扬名、光宗耀祖全孝道。忠孝两全正是儒家正统。所以许多徽人虽由于生计所迫,走上业贾之路,却终难忘业儒的理想,将经商当作权宜之计。不乏身虽服贾“而心否计然之术”之人,更有人“隐于贾,而不沦于贾”,亦有人“居商而无商商之心”,还有人认为“士不得已而贾,寄耳”。对于在明清社会异常强大顽固的封建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伦理色彩的徽州商人来说,上述种种却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最合理的宿命。

“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对徽商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作用。

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它使得徽商具备了良好的文化知识,能够察低昂、权时宜。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商业市场瞬息万变。经营者必须能够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市场、自然和社会等因素,并且具备管理组织商业活动的才能。而在儒风昌盛的程朱阙里生长的徽商,自小苦读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具备各种自然、社会知识。这使得他们在商海泛舟之时,具有独特的眼光与洞察力,对于纷繁复杂的商

机与商业现象能够理智而清醒地思考,进一步把握住市场的规律,从而在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获得厚利。

第二,“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提高了徽商的信誉,使他们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徽商在经营之中切实地践行儒家的道德伦理,诚意敬业、诚信待人、以义为利。最终的结果是使得徽商获得了顾客信任,积累了良好的商业信誉,形成商业的良性循环,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许多徽人“好行其义,不持利权,数年,货益起”;“不罔利业益振”;“临财廉,取予义”,为时不久便“致数万金”;“诚笃不欺,利反三倍”。这类事例比比皆是。不为蝇头小利所诱惑,最终却积累下来了巨额财富。

第三,“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巩固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团结,有利于徽州商帮的发展。徽州商帮是一个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商人群体。在商帮内部大商扶植小商,小商支持大商,他们之间全靠互相的信任和诚实不欺连接起来。徽商程某,在两广经商,“门下受计出子钱者恒数千人。君为相度土宜,趣物侯,人人受计不爽也。数奇则宽之以务究其材;饶羨则廉取之而归其赢。以故人乐为程君用。而自程君为大贾,其族人无不沾濡者。”^[9]卷六十一。程君五十叙儒家伦理道德对于巩固徽州商帮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促进了徽商与封建势力的结合。徽商热心投资教育事业,通过子弟的业儒入仕,与官僚士大夫交游密切。他们还借助手中的财富仗义疏财,投资于赈灾济贫、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捐助资饷、兴建书院祠堂、设置祠田、义田等,而博得封建统治者的青睐。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获得封建政府的青睐,无疑是如虎添翼。特别是把持两淮两浙盐利的徽州盐商,就是得益于封建政治势力的支持。

但道德放在逻辑优先地位的观念对于徽州商人向近代商人转变是极为不利的。徽商“贾而好儒”

的儒商特色又有其消极作用所在。

徽商“好儒”,就必然崇尚程朱理学。对于深受儒家家族伦理影响的徽商来说,“亢吾宗”、“振家声”才是他们的最终价值目标。于是,徽商捐资助饷追求“急公好义”的美誉,修祠堂、置祠田讲求“亲亲之谊”。虽不可否认有其可取之处,为徽商带来了良好的声誉,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徽商的经营。但如此种种消耗了大量原本应进入流通领域的资金,不但影响了商业资本的积累,而且加强了封建国家机器,巩固了封建宗族制度。

徽商追求“科举入仕”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在传统的家庭伦理的基础上的。因此一旦徽商通过经商获得了大量物质财富之后,他们就会将巨额资金投向土地。再通过读圣贤书以举仕,或者要求下一代尽可能转向科举,以实现“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这样,儒学的兴盛、名门望族的地位和徽商的显达就构成了一条生物链。这种循环往复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严重地影响了商业的正常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徽商的“贾而好儒”,曾经有益于徽商的经营,同时也强化了其封建性。正是由于徽商价值观对传统儒家价值观改造的不彻底,最终导致了徽商的衰落。而最根本的原因仍是由于徽商所处的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参考文献:

- [1](万历)歙志[Z].万历三十七年刊本.
- [2]汪道昆.太函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4.
- [3](万历)休宁县志[Z].万历三十五年刊本.
- [4](万历)祁门县志[Z].万历二十八年刊本.
- [5](歙县)棠塘黄氏宗谱[Z].嘉靖四十一年刊本.
- [6]吴吉祜.丰南志[Z].民国三十三年稿本.
- [7]休宁西门汪氏宗谱[Z].顺治十年刊本.
- [8](民国)歙县志[Z].民国铅印本.
- [9]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M].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刊本.

责任编辑:高 煊

Influence of Huizhou Merchants' Values

Zhao Yimei

(Center of Hui Culture Studie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 values of Huizhou Merchants modeled by two value choices: morality orientation and material orientation, hav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Huizhou merchants' values not only guided their management, but greatly shaped local society and the value system of local people as well.

Key words: Huizhou merchants; values; influence